心理学报 2018, Vol. 50, No.5, 558−571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18.00558

旁观者对集体行动的支持：目标合理性、行动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的作用*

殷 融

(潍坊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摘 要 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的方式，考察了旁观者对集体行动支持的前因变量，探讨了目标合理性、行动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等因素对旁观者态度反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的影响受行动策略因素的调节，当集体行动采用的是非暴力策略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当集体行动采用的是暴力策略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的正向作用不显著；2)当集体行动采取暴力策略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态度的影响受目标实现预期因素的调节，在低实现预期情况下，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在高实现预期情况下，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关键词 集体行动；旁观者；目标合理性；非暴力行动；暴力行动

分类号 B849: C91

1 问题提出

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是群体成员参与的以改善群体现状为目的的行动，具体可表现为请愿、游行、集会、抗议、示威等多种形式。在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集体行动的心理动员机制。经过近 30 年的实证研究积累，研究者确认了一系列会影响集体行动的前因变量，如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群体情绪(group-based emotions)、群体效能(group efficiency)、道德信仰(moral convince)等(van Zomeren, Leach, & Spears, 2012; 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 2012；薛婷，陈浩，乐国安，姚琦，2013；张书维，王二平，2011；张书维，王二平，周洁，2012)，明确了这些变量间的互相作用关系，同时还考察了不同利益情境、不同行动类型及不同行动阶段集体行动心理动员机制的差异性(Blackwood, Terry, & Duck, 2015; Shi, Hao, Saeri, & Cui, 2015；殷融，张菲菲，王元元，臧日霞，2017)，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尽管当代集体行动的心理学研究呈现多点开花的蓬勃图景，但从研究对象看，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集体行动直接参与人的心理及行为进行探讨。集体行动不仅涉及最初的参与者，还涉及到可能成为支持者的无关民众。成功的集体行动可以塑造公众信念，使公众认识到弱势群体的不公正遭遇，并将旁观者转变为支持者，引发他们的利他型抗争行动。而动员较差的集体行动则会引发公众恐慌，使旁观者感到厌恶，并引发他们的谴责与抵制。社会学及政治学研究显示，一项抗争运动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运动对公众观念的影响与塑造，得到外群体支持的抗议组织其影响力要远高于那些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的组织(Gamson, 1990)。因此，在集体行动发展过程中，旁观者的态度反应是影响行动目标是否可达成的重要因素。

现实生活中常有一些有共同身份的人联合起来支持其他群体，为了其他群体的利益而进行抗争，且他们的行动反而有可能危害到自己所属群体的地位或利益。例如，男性可能会反对职场中的女性

收稿日期：2017-06-29

*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6DJYJ04 资助。

通信作者：殷融，E-mail: yorkns@sina.cn

性别歧视，富人会要求政府对低收入者减税。近年来很多研究针对这种利他型集体行动进行了探讨。然而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往往并不是与集体行动无关的中立旁观者，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占优势地位的群体。优势群体是不平等群际关系的受益者，他们会因不平等的群际关系而体验到内疚感(guilt)或羞愧感(shame)，在这些情绪的作用下，优势群体成员才会发起或支持一些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行动，以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负面情绪感受，补救内群体的道德名誉，修复对内群体的道德认同(Paladino, Zaniboni, Fasoli, Vaes, & Volpato, 2014; Shepherd, Spears, & Manstead, 2013; Solak, Reifen Tagar, Cohen-Chen, Saguy, & Halperin, 2017)。研究发现，只有优势群体成员认为群际关系是不合理的且内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利地位负有一定责任时，才会体验到强烈的内疚感，并更愿意参与支持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Leach, Iyer, & Pedersen, 2006; Saguy, Chernyak-Hai, Andrighetto, & Bryson, 2013; Stewart, Latu, Branscombe, & Denney, 2010)。

综上，以往研究探讨集体行动背景下的利他行动时，主要关注的是与弱势群体或触发事件具有利益关系的群体，且这些研究大多考虑的是个体参与利他集体行动的意愿，而不是他们对已发生的集体行动的反应。当社会发生抗争事件时，与该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旁观者是否会支持集体行动？哪些变量在其中具有影响机制？本研究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1.1　目标合理性

集体行动是具有特定目标诉求的行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集体行动都具有道德正当性，例如2016年中国大陆各地陆续发生的一系列“反洋快餐运动”就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抨击与抵制。由此可见，集体行动目标诉求与旁观者价值信念的一致性会影响到该行动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力度。

根据观点内群体(Opinion-Based Group)理论，集体行动中所谓的“群体” 并不一定是具有明确社会意义的身份类别群体，而可以是广泛意义上具有共同信念、价值观或权益诉求的观念群体(McGarty, Bliuc, Thomas, & Bongiorno, 2009)，群体成员是基于对观点的支持和认同去参与行动的，研究发现，个体越认同内群体的价值信念或抗议活动目标，越容易投身其中(Blackwood & Louis, 2012; Klandermans, 2014; Mannarini & Fedi, 2012)。对利他集体行动的研究也发现，当优势群体成员认同弱势群体的价值观、道德信念或奋斗目标时，更有可能为了改善弱势群体的权益而发动或参与集体行动(Barth, Jugert, Wutzler, & Fritsche, 2015; van Zomeren, Postmes, Spears, & Bettache, 2011; Wiley, Srinivasan, Finke, Firnhaber, & Shilinsky, 2013)。与之相类似，旁观者对集体行动的态度反应可能也会受到其目标诉求的影响，当旁观者知觉到集体行动的诉求更为正当、合理时，为了捍卫自己所尊崇的道德价值，他们可能会对集体行动表现出更多的认可与支持。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假设 1：

旁观者关于集体行动目标合理性的评估会影响他们对行动的态度反应，高合理目标会激发旁观者更积极的支持态度。

1.2　行动策略

在集体行动中，群体成员的行为策略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按照行动策略是否涉及暴力可将集体行动分为非暴力行动(non-violent action)与暴力行动(violent action)。其中，非暴力行动破坏力小，对抗较为温和，一般符合社会系统中包括道德、法律、意识形态在内的既存规则，如和平游行、联合签字抗议；相反，暴力行动破坏力大，对抗较为激烈，一般会违背社会规则，如冲击政府、破坏公物(Wright, Taylor, & Moghaddam, 1990)。近年来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开始关注暴力集体行动，研究发现，强烈的道德信念、较弱的效能感及对对立群体的蔑视、憎恨感是引发暴力行动的主要因素(Shuman, Cohen-Chen, Hirsch-Hoefler, & Halperin, 2016; Tausch et al., 2011; van Bergen, Feddes, Doosje, & Pels, 2015; Zaal, van Laar, Stahl, Ellemers, & Derks, 2011)。尽管研究者已初步澄清了暴力策略与非暴力策略在心理动因方面的差异，但这两种策略是否对旁观者产生不同的动员作用？目前未有实证研究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由于暴力集体行动会扰乱公共秩序、破坏社会安定，一般情况下民众会更支持和平、温和的抗议手段，厌恶极端的暴力抗议活动，很多暴力行动甚至会激起相应的“反运动”。例如，台湾“反服贸”运动时抗议者冲击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就遭到大批台湾民众的反对。在现代社会普遍厌弃暴力的氛围下，非暴力行动可以更好的向中立者传达行动诉求的合理性，从而动摇公众观念，赢得公众支持。因此，在集体行动背景下，即便参与者的诉求较为合理，但如果他们使用了不合理的暴力行动策略，也可能会招致旁观者的厌恶与反对。基于以上分析，本研

究提出假设 2：

相比非暴力行动，旁观者对暴力行动的支持会更少(假设 2a)，且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态度的影响会受行动策略因素的调节(假设 2b)，当集体行动采用的是非暴力策略时，目标合理性会对旁观者的支持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当集体行动采用的是暴力策略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态度的影响不显著。

1.3 目标实现预期

尽管暴力策略容易遭受公众谴责，但社会中也有很多暴力的抗议行动会获得他人的理解。例如，在日本上世纪 70 年代水俣病受害者向窒素公司求偿过程中，受害者在最初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采取了暴力手段，但该行动得到了当时很多媒体及民众的支持(George, 2002)。这说明在特定环境下，旁观者也会对暴力行动表现出接纳。

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表明，当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是稳定的且改善群体地位的合理渠道被完全封闭时，弱势群体成员会更倾向于做出具有对抗性与暴力性特征的破坏行为。Scheepers, Spears, Doosje 和 Manstead (2006)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再无可失(nothing to lose)”策略。大量心理学研究证明，一旦抗争者认为依靠温和的非暴力策略不足以实现预期目标，便会选择破坏性更强的集体行动(Jiménez-Moya, Spears, Rodríguez-Bailón, & de Lemus, 2015; Owuamalam, Issmer, Zagefka, Klaßen, & Wagner, 2014; Ransford, 1968; Tausch et al., 2011)。

从旁观者立场看，旁观者对暴力行动的支持态度可能与抗争者参与暴力行动的心理机制具有相似性。旁观者对集体行动进行评估时不仅会考虑行动诉求与手段策略的合理性，还会对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如果旁观者认为集体行动具有高合理目标，但目标却很难实现，此时他们可能更能理解暴力策略的必要性，对暴力策略表现出更高的容忍与接纳。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3：

当集体行动采取非暴力策略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态度的作用不受目标实现预期因素的影响(3a)；当集体行动采取暴力策略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态度的影响受目标实现预期因素的调节，旁观者关于集体行动目标实现的预期较低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的支持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旁观者关于集体行动目标实现的预期较高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的支持意愿则不具有显著作用(3b)。

从以上综述分析可以看出，过往集体行动的研究主要考虑的是参与者的心理动员机制，虽然近年来一些研究已开始探讨不同群体、不同情境及不同行动策略下集体行动前因变量的差异性，但这些研究依然关注的是行动的直接参与者，而很少选择与抗争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旁观者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则聚焦这一问题，通过 3 项实验对上文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

2 实验 1：行动策略与目标合理性对支持态度的作用

实验 1 计划对研究假设 1 与假设 2 进行验证，初步探讨集体行动目标合理性及行动策略因素对旁观者支持态度的影响。本研究以虚拟的拆迁纠纷事件为研究背景，选择与该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大学生作为被试，在描述材料中对抗议事件的目标合理性及行为策略进行实验操纵，并调查被试对该集体行动的支持态度。研究假设认为：被试对高合理目标行动的支持要高于对低合理目标行动的支持，且目标合理性对支持态度的作用会受行动策略的调节，在非暴力行动情境下，目标合理性对被试支持态度的影响作用会更显著，但在暴力行动情境下，目标合理性对被试支持态度则不存在显著影响。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选取潍坊学院学生会成员作为被试，被试的年龄跨度为 18 岁到 22 岁，平均年龄为 19.4 岁(SD = 1.45 岁)，共 139 人，其中男性 87 人，女性 52 人，所学专业涵盖应用心理、教育技术、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旅游管理、历史、计算机等 8 个专业。

2.1.2 研究前测

为选择适当的实验材料，要求 60 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大学生对几种常见的非暴力集体行动及暴力集体行动的暴力性进行评分。评分方式参考同类研究(Becker, Tausch, Spears, & Christ, 2011)，包含两个题项(α = 0.89)：“你认为该抗议行动采取的方式是否暴力？” “你认为该抗议行动采取的方式是否极端？”评分方式为 7 点计分，1 代表“非常不符合”，7 代表“非常符合”，分值越高代表被试判断抗议行动所采取的方式越暴力。将被试对每种行动策略的暴力评分均值进行单样本平均数 t 检验(与中值 4 相比较)，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行动策略的暴力评分程度

行动策略	$M \pm SD$	$t(59)$
非暴力行动		
联名向负责人写建议信	1.45 ± 0.59	−33.23***
录制视频传播，说明内群体遭遇	1.50 ± 0.59	−32.46***
在广场游行示威	1.77 ± 0.72	−23.97***
在广场静坐示威	1.95 ± 0.78	−20.66***
罢工抗议	2.13 ± 0.79	−18.27***
暴力行动		
冲击占领市政府	6.23 ± 0.65	26.72***
攻击对立者或利益侵占者	6.72 ± 0.45	46.31***
破坏对立者的私人财物	6.70 ± 0.46	45.26***
破坏公路等公共设施	6.17 ± 0.67	23.12***
破坏施工车辆等工具	6.30 ± 0.62	28.79***

注：与中值“4”比较的差异结果; *** $p < 0.001$

2.1.3　研究程序

实验 1 为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第一个自变量为目标合理性，分为两个水平：高合理目标，低合理目标；第二个自变量为行动策略，分为两个水平：暴力行动，非暴力行动。因变量是被试对集体行动的支持态度。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4 个实验条件组。所有被试分被安排在同一间大会议室进行实验，整个实验期间被试独立活动，单独阅读材料填写问卷，在实验过程中无互动。实验开始前，主试向被试介绍实验规则及目的，宣称本研究是了解学生对本地热点时政问题的看法。

所有实验材料集中于一份问卷。问卷向被试描述了一场发生在 W 市的虚拟集体行动事件。事件的背景是 W 市要修建新高铁站，该项目涉及选址地居民拆迁问题，居民因对补偿方案不满而集体抗议。事件描述中包含对自变量的实验操纵。其中，在目标合理性方面，高合理目标组材料称对拆迁户的补偿没有达到正常标准，拆迁户在签订拆迁协议后发现自己实际利益受到了损失，他们希望通过采取联合行动迫使政府提高对他们的补偿；而低合理目标组材料称对拆迁户的补偿已经超正常标准，但拆迁户在签订拆迁协议后发现他们原本可以要求更多的安置费，因此希望通过采取联合行动迫使政府再增加对他们的补偿。

在行为策略方面，非暴力行动组材料描述拆迁户采取的抗议方式皆为前侧材料中典型的非暴力行动，包括联合向政府签字请愿、集体录制视频说明自己的遭遇、在市府广场静坐；暴力行动组材料描述拆迁户采取的抗议方式皆为前侧材料中典型的暴力行动，包括以武力方式威胁施工队不准进入拆迁区、破坏施工车辆、占领市政楼大厅。

为保证对行为策略的操纵不会影响被试对集体行动目标合理性的判断，将测量问题安排在实验材料中与问题相对应的描述内容之后，测量问题包括被试自我知觉的与该事件的利益关系、对集体行动目标合理性的评估及对该集体行动的支持态度。

2.1.4　变量测量

利益相关性：包含 1 个题项，“你认为该事件是否与你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评分方式为 7 点计分，1 代表“完全无关”，7 代表“非常密切”，分值越高代表被试越认为集体行动事件与自己具有密切的利益关系。

目标合理性：参考同类研究(van Zomeren, Postmes, et al., 2012)，目标合理性包含 4 个题项($\alpha = 0.92$)，“你认为该抗议行动的目标是否合情合理？” “你认为该抗议行动的目标是否符合社会规则？” “你是否认同该抗议行动的目标？” “你认为该抗议行动的目标是否应该得到满足？”。评分方式为 7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合理/完全不符合/完全不认同/完全不应该”，7 代表“完全合理/完全符合/完全认同/完全应该”，分值越高代表被试判断抗议行动的目标越合理。

支持态度：参考同类研究(Thomas & Louis, 2014)，支持态度包含个 4 个题项($\alpha = 0.84$) “你是否愿意对这一抗议表示支持？” “你是否赞同这一抗议行动？” “你是否对该抗议行动感到厌恶？(该题项反向计分)” “你认为该抗议活动是否应停止？(该题项反向计分)”评分方式为 7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支持/完全不赞同/完全不厌恶/完全不应该”，7 代表“完全支持/完全赞同/完全厌恶/完全应该”，分值越高代表被试越支持抗议行动。

2.2　结果

2.2.1　自变量操纵检验

所有被试按要求完成了实验，检查被试在利益相关性问题上的评分，结果显示所有被试在该问题上的评分都小于中值 4，说明被试认为自己与实验材料描述的事件无高水平利益关系，因此所有被试数据都是有效数据，被试组别人数如表 2 所示。

以目标合理性与行动策略为自变量，以被试在目标合理性题项上的评分均值为因变量进行组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只有目标合理性变量的主效应显著，$F(1, 135) = 120.52$, $p < 0.001$, $\eta^2 = 0.472$,

高合理目标组被试在该题项的评分均值(M = 5.36, SD = 0.85)显著大于低合理目标组被试在该题项的评分均值(M = 3.65, SD = 0.98), 说明实验材料对目标合理性这一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

2.2.2 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的态度差异

以目标合理性与行动策略为自变量, 以被试在支持态度题项上的评分均值为因变量进行组间方差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 目标合理性的主效应显著, $F(1, 135) = 33.75$, $p < 0.001$, $\eta^2 = 0.200$; 行动策略的主效应显著, $F(1, 135) = 24.82$, $p < 0.001$, $\eta^2 = 0.155$; 目标合理性与行动策略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135) = 11.38$, $p = 0.001$, $\eta^2 = 0.078$。

表 2 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对集体行动的支持态度

目标合理性	行动策略	
	非暴力策略	暴力策略
高合理目标	5.25 ± 1.02 (n = 36)	3.81 ± 0.92 (n = 35)
低合理目标	3.67 ± 1.16 (n = 35)	3.39 ± 0.96 (n = 33)

进一步分析如图 1 所示, 被试对非暴力行动的支持在整体上要高于对暴力行动的支持, 但这种差异在高合理目标条件下更为显著。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当实验材料描述的是非暴力行动时, 被试对高合理目标行动的支持要高于对低合理目标行动的支持, 且差异达到显著性, $F(1, 135) = 43.10$, $p < 0.001$, $\eta^2 = 0.242$; 而当实验材料描述的是暴力行动时, 虽然被试对高合理目标行动的支持也要高于对低合理目标行动的支持, 但差异只达到边缘显著, $F(1, 135) = 2.91$, $p = 0.091$, $\eta^2 = 0.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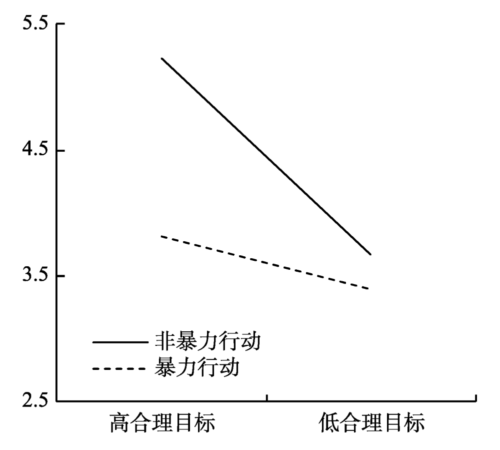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对集体行动的支持态度

2.3 讨论

实验 1 以虚构的拆迁补偿抗议事件为背景, 考察了目标合理性与行动策略这两种变量对旁观者行动支持态度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 被试对高合理目标行动的支持要高于对低合理目标行动的支持, 但该效应受行动策略的调节：在非暴力行动情境下, 高合理行动组被试的支持态度要显著高于低合理行动组被试的支持态度, 但在暴力行动情境下, 高合理行动组被试的支持态度与低合理行动组被试支持态度的差异仅达到边缘显著, 研究假设 1 与假设 2 均得证。

在本实验中, 当集体行动的目标合理性较低时, 无论该行动使用了何种策略模式, 被试对该行动的支持态度都会较低, 也就是说, 目标合理性是获取旁观者支持的先决条件。当旁观者知觉到集体行动的奋斗目标更为正当、合理、更符合自己的道德信念时, 他们才会对该行动表现出更多支持, 相反, 当旁观者认为集体行动的奋斗目标并不符合自己认可的社会道德标准时, 他们则会对该行动表现出抵制与厌恶。

本实验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证明在暴力行动情境下, 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态度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性。也就是说, 当呈现的集体行动被描述为使用暴力策略时, 无论该行动目标是否合理, 被试对该行动的支持都会处于较低水平。实际上, 由于暴力行动策略具有更强的破坏性, 更能够胁迫对立群体做出改变。因此在诉求正当的情况下旁观者可能会更支持弱势群体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斗争, 这样可以更高效的实现社会公正。然而本实验结果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证明即使在目标合理的情况下, 旁观者也会更加支持和平的、温和的非暴力策略。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结果, 是因为暴力手段本身具有道德不正当性, 在现代社会暴力被普遍认为有违法律及道德规则, 而暴力行动的发起者也往往会被被贴上“激进”、“极端”等负面标签。在集体行动背景下, 为了维持积极的道德自我认同, 旁观者会从心理上远离暴力行动及其参与者, Bashir, Lockwood, Chasteen, Nadolny 和 Noyes (2013)就曾研究证明, 当个体认为抗争活动中某些参与者(女权主义者、环境主义者)太过于激进、好斗时, 会降低对该行动的支持。另外, 大量社会研究表明, 暴力抗议极易引发大规模社会骚乱(如美国 1992 年洛杉矶黑人暴动), 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因此, 即便集体行动具有高合理性的目标, 出于对暴力手段的恐惧与厌恶, 旁观者也不愿意对暴力策略表示支持。综合来看, 本实验结论与研究假设一致：证明

集体行动只有使用合理手段去争取合理目标时，才能够最大化的获取旁观者的支持。

3　实验 2：行动策略、目标合理性与目标实现预期对支持意愿的作用

实验 1 初步考察了集体行动目标合理性及行动策略对旁观者支持态度的影响，该研究证明当集体行动采取暴力策略时，无论行动的目标合理性高低，旁观者的支持态度都会处于较低水平。然而，按照本研究假设 3 的分析，旁观者对集体行动进行评估时不仅会考虑抗议者诉求和手段的合理性，还会对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在集体行动目标诉求正当性较高的情况下，如果旁观者认为行动无法达成预期目标，他们对暴力策略的接纳度可能会提高，会更愿意对暴力策略表示支持。实验 2 对此假设进行验证。另外，实验 1 主要因变量指标是旁观者对集体行动的支持态度，实验 2 则选择被试对集体行动的实际支持意愿作为因变量指标，考察旁观者参与某些具体支持行动的意愿是否受假设变量的影响。

实验 2 的研究范式与实验 1 相同，以虚拟的抗争事件为研究背景，选择与该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大学生作为被试，在描述材料中对抗议事件的目标合理性、行为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进行实验操纵，并调查被试对该集体行动的支持意愿。研究假设认为：当抗议事件涉及暴力策略时，目标实现预期调节目标合理性与被试行动支持意愿的关系，在高实现预期情境下，目标合理性的变化并不会导致被试对暴力行动支持意愿的差异，但在低实现预期情境下，目标合理性的提高会导致被试对暴力行动表现出更积极的支持意愿。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选取潍坊学院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被试的年龄跨度为 18 岁到 22 岁，平均年龄为 19.7 岁(SD = 1.32 岁)，共 255 人，其中男性 123 人，女性 132 人，所学专业涵盖教育技术、物理、小学教育、化学、中文、数学、历史等十几个专业。

3.1.2　研究程序

实验 2 为三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第一个自变量为目标合理性，分为两个水平：高合理目标，低合理目标；第二个自变量为目标实现预期，分为两个水平：高实现预期，低实现预期；第三个自变量为行动策略，分为两个水平：暴力行动，非暴力行动。因变量是被试对集体行动的支持意愿。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8 个实验条件组，实验过程与实验 1 一致。

所有实验材料集中于一份问卷。问卷第一部分向被试描述了一场虚拟的镇民集体抗议事件。事件的背景是 W 市要在其下属的 X 镇新建一座大型环保能源发电站，该镇居民对电站项目的安全性问题有所怀疑因此组织集体抗议。事件陈述中包含对自变量的实验操纵。

其中，在目标合理性方面，高合理目标组材料称尽管政府宣称该项目是环保项目，不会产生任何环境风险，但由于没有对外公示具体的科学论证资料，且镇政府可以由此项目获得大量利益，因此镇民对此项目感到担心，他们希望通过采取联合行动迫使政府暂停该项目，进行充分且公开的风险论证。而低合理目标组材料称尽管政府已经对该项目的风险进行了多次公开科学的论证，确认该项目不会对附近环境产生任何危害，且 X 镇由于工业、制造业较为发达，本身是 W 市的重要耗电区，但镇民依然反对在本镇建设发电站，他们希望通过采取联合行动迫使政府将该项目迁往其他城镇。

在目标实现预期方面，实验材料描述了五起近年来国内发生的相似抗议事件，其中高实现预期组材料中，四起事件的结果被描述为政府向抗议者妥协，暂停了建设规划；而低实现预期组材料中，四起事件的结果被描述为政府没有向抗议者妥协，坚持了原来的建设规划。

在行为策略方面，非暴力行动组材料中描述镇民采取的抗议方式皆为前侧材料中的典型非暴力行动，包括集体录制视频说明本镇的情况及在镇政府门口悬挂标语抗议；暴力行动组材料描述镇民采取的抗议方式皆为前侧材料中的典型暴力行动，包括围堵镇政府大楼及破坏该项目地基。

为保证对行为策略的操纵不会影响被试对集体行动目标合理性的判断，将测量问题安排在实验材料中与问题相对应的描述内容之后，测量问题包括被试自我知觉的与该事件的利益关系、对集体行动目标合理性的评估、对抗议行动目标实现可能性的评估及对该集体行动的支持意愿。

3.1.3　变量测量

利益相关性：测量方式同实验 1，包含 1 个题项。

目标合理性：测量方式同实验 1，包含 4 个题项(α = 0.90)。

目标实现预期：参考同类研究(Tausch et al., 2011)，目标实现预期包含个 3 个题项(α = 0.92) “你认为政府是否会接受抗议者的建议？” “你认为抗

议者是否能实现他们的预定目标？” “你认为抗议者的联合行动是否可以改变政府决策？”评分方式为7点计分, 1代表“非常不可能”, 7代表“非常可能”, 分值越高代表被试对抗议目标实现的预期越高。

支持意愿：包含 2 个题项($\alpha = 0.84$) “你是否愿意在朋友圈转发这一事件以表达对该抗议事件的支持？” “你是否愿意拍摄一张手举抗议标语的照片以表达对抗议者的支持？”评分方式为 7 点计分, 1 代表“非常不愿意”, 7 代表“非常愿意”, 分值越高代表被试越愿意支持抗议行动。

3.2 结果

3.2.1 自变量操纵检验

3 名被试没有按要求完成实验, 检查被试在利益相关性问题上的评分, 结果显示有 5 名被试在该问题上的评分大于等于中值 4, 为保证实验材料所描述的事件与被试无高水平直接利益关系, 删除这 5 名被试的数据, 其他所有被试数据都是有效数据, 被试组别人数如表 3 所示。

以目标合理性、行动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为自变量, 以被试在目标合理性和目标实现预期题项上的评分为因变量分别进行组间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当测量变量为目标合理性评分时, 只有目标合理性变量的主效应显著, $F(1, 239) = 163.19$, $p < 0.001$, $\eta^2 = 0.406$ ($M_{高合理} = 5.31$, $SD = 0.94$; $M_{低合理} = 3.72$, $SD = 0.99$), 其余变量及变量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当测量变量为目标实现预期评分时, 只有目标实现预期变量的主效应显著, $F(1, 239) = 199.57$, $p < 0.001$, $\eta^2 = 0.455$ ($M_{高预期} = 5.86$, $SD = 0.96$; $M_{低预期} = 4.07$, $SD = 1.01$), 其余变量及变量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这说明实验材料对目标合理性及实现预期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 同时也说明被试的目标实现预期评分并没有受到其他变量操纵的影响。

3.2.2 三变量交互效应

以目标合理性、行动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为自变量, 以被试在支持意愿题项上的评分均值为因变量进行组间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三因素交互作用达到边缘显著, $F(1, 239) = 3.59$, $p = 0.059$, $\eta^2 = 0.015$。为了更清晰展示变量影响关系, 对不同行动策略组别下目标合理性及目标实现预期的交互作用进行进一步分析。

对非暴力行动情境下目标合理性与目标实现预期对支持意愿的作用进行组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目标合理性的主效应显著, $F(1, 118) = 48.67$, $p < 0.001$, $\eta^2 = 0.287$; 实现预期的主效应显著, $F(1, 118) = 3.97$, $p = 0.048$, $\eta^2 = 0.032$; 目标合理性与实现预期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118) = 0.02$, $p = 0.878$, $\eta^2 < 0.001$, 不同实现预期条件下目标合理性对被试支持意愿的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如图 2 所示, 被试对高合理行动及低合理行动的支持意愿在不同实现预期水平上呈现皆近似平行的低斜率走势, 但两条线段在纵坐标轴上存在较大差异。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高实现预期条件下, 高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要显著高于低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 $F(1, 118) = 24.85$, $p < 0.001$, $\eta^2 = 0.174$; 同样, 在低实现预期条件下, 高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也要显著高于低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 $F(1, 118) = 22.75$, $p < 0.001$, $\eta^2 = 0.162$。也就是说, 无论实现预期水平高低, 高合理行动组被试的行动支持意愿都会较高, 低合理行动组被试的行动支持意愿都会较低。因此, 在非暴力行动情境下, 目标合理性是影响被试对集体行动支持意愿的主要因素。

对暴力行动情境下目标合理性与目标实现预期对支持意愿的作用进行组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目标合理性的主效应显著, $F(1, 121) = 18.25$, $p < 0.001$, $\eta^2 = 0.128$; 目标实现预期的主效应显著, $F(1, 121) = 13.99$, $p < 0.001$, $\eta^2 = 0.101$; 目标合理性与实现预期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121) = 6.26$, $p = 0.014$, $\eta^2 = 0.048$, 不同实现预期条件下行动合理性对被试支持意愿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如图 3 所示, 被试对低合理行动的支持意愿在不同实现预期水平上呈现近似水平的低斜率走势, 但对高合理行动的支持意愿在不同实现预期水平上则呈现高斜率走势。具体而言, 在高实现预期条件下, 虽然高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高于低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 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性, $F(1, 121) =$

表 3 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对集体行动的支持意愿

目标合理性	非暴力策略		暴力策略	
	高实现预期	低实现预期	高实现预期	低实现预期
高合理目标	4.98 ± 0.80 (n = 31)	5.32 ± 0.94 (n = 32)	3.75 ± 1.18 (n = 33)	4.98 ± 1.10 (n = 31)
低合理目标	3.65 ± 1.08 (n = 30)	4.05 ± 1.27 (n = 29)	3.40 ± 1.09 (n = 30)	3.65 ± 1.04 (n =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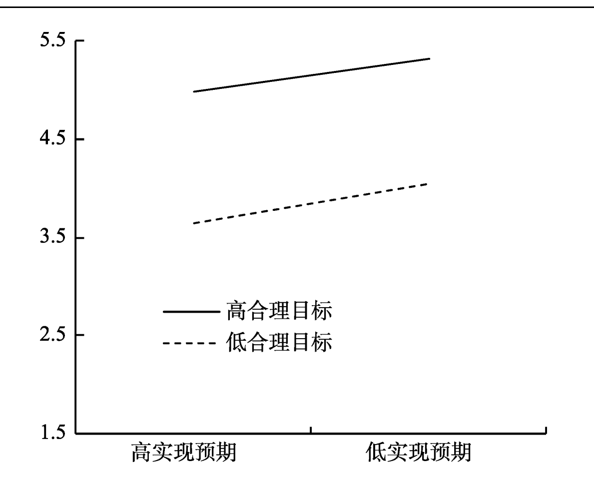


图 2　非暴力行动情境下目标合理性与目标实现预期对支持意愿的交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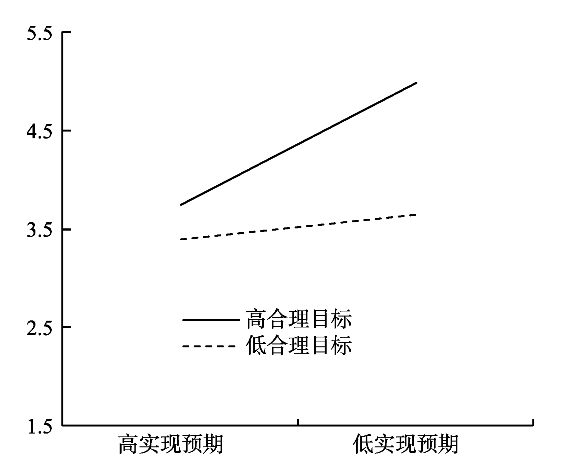


图 3　暴力行动情境下目标合理性与旁观效能对支持意愿的交互作用

1.54, p = 0.217, η^2 = 0.013；而在低实现预期条件下，高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要高于低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且差异达到显著性，F(1, 121) = 22.24, p < 0.001, η^2 = 0.155。也就是说，虽然被试对高合理行动的支持意愿在整体上要高于对低合理行动的支持意愿，但该差异主要存在于低实现预期组，只有在满足低目标实现预期及高合理目标的情况下，被试才会对暴力行动有较高支持意愿，其他三种情况下被试支持意愿均处于较低水平。

3.3　讨论

实验 2 以虚构的反建设发电站项目为研究背景，选择与该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学生为被试，通过对该事件的目标合理性、目标实现预期及行动策略进行实验操纵，考察了这些变量对旁观者行动支持意愿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三因素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行动策略调节不同实现预期水平下目标合理性与支持意愿的关系，变量间的作用方向与关系同预测一致，研究假设 3 得证。

具体而言，研究显示在非暴力情境下，目标合理性是决定被试对集体行动支持意愿的主要变量，而实现预期的作用则较小，且这两个变量不存在交互作用。这说明当集体行动采用的是非暴力策略时，只要旁观者认为该行动的目标诉求具有高合理性，无论该行动是否容易实现预期目标，他们都会表现出较高的支持意愿。以往关于集体行动前因变量的研究就表明，群体成员对行动目标的认同水平是决定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当个体对群体目标有坚定的道德认同时，会产生强烈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抗争运动是否会产生具体收益，他们都会愿意投身其中并为之付出努力(Blackwood & Louis, 2012; Mannarini & Fedi, 2012)。本实验则证明类似的效应也存在于集体行动对旁观者的动员机制中：在非暴力情境下，目标实现预期对旁观者支持意愿的影响相对较弱，旁观者对集体行动目标合理性的评估是影响他们支持意愿的最重要因素，该研究结论与实验 1 的结果也具有一致性。

而在暴力行动情境下，目标合理性对被试支持意愿的作用则会受到目标实现预期变量的调节，在低实现预期的情况下，目标合理性会对支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这是因为，目标实现预期反映了旁观者对集体行动是否可达成预期目标的评估，在高实现预期条件下，旁观者预测对立者较为容易向抗议者妥协，抗议者达成目标的可能性很高，此时暴力策略的使用会对社会秩序及群际关系造成不必要的破坏，这会进一步凸显暴力策略的不正当性，导致旁观者对暴力策略更加抵触与反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行动目标是否合理，旁观者都会认为集体行动不应采取暴力策略，因此，被试在集体行动具有高合理目标及低合理目标时都会表现出对暴力行动一致的低支持意愿。而在低实现预期条件下，旁观者预测对立者不会向抗议者妥协，抗议者达成目标的可能性较低，此时高合理目标凸显了集体行动采用暴力策略的必要性，因此旁观者会对暴力行动会表现出较为宽容的态度。也就是说，低实现预期降低了旁观者对暴力策略的抵触与反感，当旁观者认为弱势群体的合理目标无法实现时，他们对集体行动中暴力策略的心理接受度会有所提高，从而对暴力行动表现出更高的支持意愿。

4 实验 3：行动策略、目标合理性与目标实现预期对支持意愿影响作用的重复性验证

实验 2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证明了不同行动策略情境下，目标实现预期与目标合理性会对旁观者者的支持意愿产生不同作用。然而，本研究还具有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实验 2 从实验设置来看，本市大学生相对于本市存在潜在环境威胁的电站并不属于完全中立的旁观者(虽然研究中通过操作检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控制)，在面对公共问题时，被试可能本身具有一定倾向性；另外，实验 1 与实验 2 所涉及的实验情景中抗议群体(拆迁户、村民)与诉求对象(政府)在政治力量上存在非常悬殊的差距，被试可能会对明显处于弱势的一方产生情感预设，这可能会影响被试对目标合理性、行为策略及支持意愿等变量的判断反应；再者，在实验 2 中，可能由于被试数量不足的原因，研究的核心结果——三变量交互作用仅边缘显著，研究假设 3 的支持不够有力。鉴于此，实验 3 采用不同的背景设置，对实验 2 的结论进行重复验证。

4.1 研究方法

4.1.1 被试

选取潍坊学院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被试的年龄跨度为 18 岁到 22 岁，平均年龄为 19.5 岁(SD = 1.28 岁)，共 310 人，其中男性 147 人，女性 163 人，所学专业涵盖教育技术、物理、小学教育、化学、中文、数学、历史等十几个专业。

4.1.2 研究程序

实验 3 为三因素被试间设计，变量设置与实验程序同实验 2 相同，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8 个实验条件组。

所有实验材料集中于一份问卷。问卷第一部分向被试描述了一场虚拟的发生在南方某城市的小区业主集体抗议事件。事件的背景该小区业主因“学区房”问题对开放商不满，因此组织集体抗议要求获得赔偿。事件陈述中包含对自变量的实验操纵。

其中，在目标合理性方面，高合理目标组材料称开发商在售楼时以“学区房”为卖点，承诺业主该小区附近会建一所包含九年义务教育学段的重点学校，小区业主的子女可以直接入读该校。很多业主在两年前该小区开盘时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了购买住房。但实际上，最近学校建成后招生政策与开发商许诺的不一致，该学校没有对该小区的专属优惠政策。因此，小区业主希望通过采取联合行动获得赔偿。而低合理目标组材料称开放商当初并没有承诺该小区一定能享受上学优惠策略，而且新建学校的招生政策未定，很多业主是以“炒房”作为投资手段，认为学区房未来价格会大幅上涨，但该小区所在地段近两年来房价涨幅大大低于该城市其他地段，因此这些炒房的业主以“学区房”问题为借口，希望通过联合行动获得补偿。

在目标实现预期方面，实验材料描述了五起近年来国内发生的相似抗议事件，其中高实现预期组材料中，四起事件的结果被描述为开放商向业主妥协，做出了相应补偿；而低实现预期组材料中，四起事件的结果被描述为开发商由于实际并未违法操作，因此没有向业主妥协，业主没获得任何补偿。

在行为策略方面，非暴力行动组材料中描述业主采取的抗议方式皆为前侧材料中的典型非暴力行动，包括集体录制视频说明本小区的情况及在小区门口悬挂标语抗议；暴力行动组材料描述业主采取的抗议方式皆为前侧材料中的典型暴力行动，包括围堵打砸物业中心及破坏该开发商新楼盘的项目地基。

为保证对行为策略的操纵不会影响被试对集体行动目标合理性的判断，将测量问题安排在实验材料中与问题相对应的描述内容之后，测量问题包括被试自我知觉的与该事件的利益关系、对集体行动目标合理性的评估、对抗议行动目标实现可能性的评估及对该集体行动的支持意愿。变量测量方式同实验 2。

4.2 结果

4.2.1 自变量操纵检验

8 名被试没有按要求完成实验，检查被试在利益相关性问题上的评分，结果显示有 7 名被试在该问题上的评分大于等于中值 4，为保证实验材料所描述的事件与被试无高水平直接利益关系，删除这 7 名被试的数据，其他所有被试数据都是有效数据，被试组别人数如表 3 所示。

以目标合理性、行动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为自变量，以被试在目标合理性和目标实现预期题项上的评分为因变量分别进行组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当测量变量为目标合理性评分时，只有目标合理性变量的主效应显著，$F(1, 287) = 301.59$, $p < 0.001$, $\eta^2 = 0.515$ ($M_{高合理} = 5.42$, $SD = 0.81$; $M_{低合理} = 3.63$, $SD = 0.94$)，其余变量及变量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当

测量变量为目标实现预期评分时，只有目标实现预期变量的主效应显著，$F(1, 287) = 227.50, p < 0.001, \eta^2 = 0.442$ ($M_{高预期} = 5.32, SD = 1.02$; $M_{低预期} = 3.56, SD = 0.97$)，其余变量及变量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这说明实验材料对目标合理性及实现预期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同时也说明被试的目标实现预期评分并没有受到其他变量操纵的影响。

4.2.2　三变量交互效应

以目标合理性、行动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为自变量，以被试在支持意愿题项上的评分均值为因变量进行组间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F(1, 287) = 5.24, p = 0.023, \eta^2 = 0.021$。由于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为了更清晰展示变量影响关系，对不同行动策略组别下目标合理性及目标实现预期的交互作用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 4　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对集体行动的支持意愿

目标合理性	非暴力策略		暴力策略	
	高实现预期	低实现预期	高实现预期	低实现预期
高合理目标	5.04 ± 0.99 (n = 37)	5.29 ± 0.89 (n = 38)	3.67 ± 1.13 (n = 39)	4.89 ± 1.16 (n = 37)
低合理目标	3.59 ± 1.14 (n = 36)	3.96 ± 1.08 (n = 35)	3.35 ± 1.04 (n = 36)	3.57 ± 0.91 (n = 37)

对非暴力行动情境下目标合理性与目标实现预期对支持意愿的作用进行组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目标合理性的主效应显著，$F(1, 142) = 66.45, p < 0.001, \eta^2 = 0.319$；实现预期的主效应接近显著，$F(1, 142) = 3.19, p = 0.076, \eta^2 = 0.022$；目标合理性与实现预期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142) = 0.11, p = 0.745, \eta^2 = 0.001$，不同实现预期条件下目标合理性对被试支持意愿的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高实现预期($F(1, 142) = 35.96, p < 0.001, \eta^2 = 0.202$)与低实现预期($F(1, 142) = 30.59, p < 0.001, \eta^2 = 0.177$)条件下，高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都要显著高于低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

对暴力行动情境下目标合理性与目标实现预期对支持意愿的作用进行组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目标合理性的主效应显著，$F(1, 145) = 22.14, p < 0.001, \eta^2 = 0.133$；目标实现预期的主效应显著、，$F(1, 142) = 17.17, p < 0.001, \eta^2 = 0.106$；目标合理性与实现预期的交互作用显著，$F(1, 145) = 8.29, p = 0.005, \eta^2 = 0.054$，不同实现预期条件下行动合理性对被试支持意愿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高实现预期条件下，高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与低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F(1, 145) = 1.69, p = 0.196, \eta^2 = 0.011$；而在低实现预期条件下，高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要显著高于低合理目标组被试的支持意愿，$F(1, 145) = 28.65, p < 0.001, \eta^2 = 0.165$。

4.3　讨论

实验 3 重复了实验 2 的研究模式，考察了目标合理性、目标实现预期及行动策略变量对旁观者行动支持意愿的影响。不同于实验 2，本实验以虚构的业主抗议开发商事件为研究背景，抗议群体与诉求对象之间并不存在悬殊的政治力量对比，被试在身份、地域及利益方面与抗议群体均不存在明显的关联，另外，抗议事件主要涉及私人问题而非公共问题，这可以进一步避免被试产生心理倾向性。在这种情况下，实验 3 的研究结果依然与实验 2 保持一致，结果显示：三因素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行动策略调节不同实现预期水平下目标合理性与被试支持意愿的关系。具体而言，对于非暴力行动，无论实现预期水平高低，目标合理性对被试的支持意愿都有显著作用，被试对高合理行动的支持都要显著高于对低合理行动的支持；而对于暴力行动，实现预期调节目标合理性与被试行动支持意愿的关系，在高实现预期条件下，目标合理性对被试行动支持意愿不存在显著作用，但在低实现预期条件下，高目标合理性会导致被试对暴力行动有更高的支持意愿。实验结论再次验证了假设 3，同时进一步说明了本研究基本假设在不同背景下的可推广性。

5　分析与讨论

在本研究的各个实验条件下，集体行动的目标合理性都是影响旁观者支持意愿的首要因素。过往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表明，群体认同是影响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核心变量，个体只有将自己视为群体中的一员，才会选择基于群体成员的身份应对群体遇到的困境与挑战。而一旦个体对内群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及心理联系，即便他们并不认为内群体处境艰难，也依然愿投入到相关的群体抗争行动中。在这种情况下，参与集体行动只是个体证明其群体成员身份、满足心理归属感的一种手段(Mannarini & Fedi, 2012)。然而，同样的动员效应并不存在于旁观者群体，旁观者对集体行动的支持主要取决于自身对行动目标的道德评估。也就是说，对于集体行动的直接参与者来说，他们会根据集体共享的价

值和意义来进行判断决策，对内群体的认同水平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而对于旁观者来说，他们会根据个人的信念和道德标准进行判断决策，对行动目标的认同水平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只有在评估集体行动的目标诉求具有较高合理性的情况下，旁观者才会对集体行动表现出较高的支持意愿。反之，如果集体行动具有不合理的目标诉求，反而可能会招致旁观者的反感与不满。

然而，高目标合理性只是高支持意愿的先决条件，旁观者对集体行动的支持还会受到行为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的影响。按照行动的破坏性程度及是否符合社会规则，集体行动可分为暴力行动及非暴力行动。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会对暴力行动表现出抵触与反感，因此，暴力手段的使用会减弱集体行动对公众的动员效应。本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实验1结果显示，当集体行动采用的是暴力策略时，目标合理性对旁观者支持态度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即使集体行动具有非常正当合理的目标诉求，但旁观者依然不会认可暴力的抗议手段，只有在目标诉求及行动策略都符合旁观者的价值标准时，集体行动才会得到他们较高的支持。该结论与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的“反暴力运动”现象相符合，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暴力行动会导致抗议群体内部的分裂：极端行为不仅会招致公众的谴责，也会引起其他抗争者的不满，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立场，他们会同暴力行动的发起者进行身份上的切割。例如，许多穆斯林团体虽然对西方政策不满，但他们会指责极端教徒发动的恐怖主义行动实际上违反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

尽管暴力抗争策略很难获得旁观者的认同，但目标实现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旁观者对暴力策略的态度。目标实现预期反映了个体对集体行动是否可达成目标的评估，实验 2 与实验 3 结果显示，在集体行动很难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如果行动目标具有高正当性，那么旁观者对暴力行动会表现出较高的支持意愿(相对于低合理目标)。社会学家 Tilly (1995)曾指出，集体行动策略的选择取决于其有效性，如果一个抗议方式长期无效的话，它就会被淘汰，转而被其他更有效的抗议形式所取代。本研究则证明，这种心理机制不仅存在于集体行动的发起者，同时也存在于旁观者群体，当旁观者认为弱势群体的合理目标无法达成时，他们也会提高对暴力行动的支持意愿。

另外，过往一些研究证明，优势群体对抗议目标实现可能性的评估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他们是否会参与支持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Greenaway, Cichocka, van Veelen, Likki, & Branscombe, 2016; Saab, Tausch, Spears, & Cheung, 2015)。然而本实验证明在低目标实现预期情况下，旁观者会对集体行动有更高的支持意愿(尽管这一效应受目标合理性及行为策略的影响)。实际上，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并不矛盾，由于优势群体成员往往是出于补偿弱势群体、提升弱势群体利益的动机而参与集体行动，因此，他们会更为看重行动的实际效果，会在预期可达成目标的情况下有更强的行动意愿，这反映了优势群体成员的工具理性决策过程。但对于旁观者来说，他们主要基于对已发生的抗争行动的道德判断而做出态度反应，因此，旁观者会在判断集体行动目标合理且行动较难达成预期目标时，更愿意为集体行动提供支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阶层逐渐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群际冲突事件呈迅速上升的趋势。经常有一些个人或群体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争取本不应得的权利或利益。本研究证明，只有以合法手段争取的合理利益才会得到公众的支持，无理取闹式的抗争只会招致公众的厌恶与抵制。另外，按照本研究实验 2 与实验 3 的数据结果，当评估弱势群体的合理目标无法达成时，虽然旁观者会提高对暴力策略的认可，但他们对暴力策略的支持意愿也并没有高于对非暴力策略的支持意愿。与此相对应，暴力策略的行动成本却更高，因此，实际上在各种条件下非暴力策略都是更为经济且有效的抗争手段。这一结论恰恰也符合当代社会运动的特征，在现代社会，组织良好、目标明确且运行高效的抗议活动往往特别强调抗争的非暴力性，那些明智的领导者也深知，只有非暴力手段才可以更好的将旁观者转变为支持者，暴力抗争则会削弱自身的影响力。

综合来看，本研究拓展了集体行动研究的研究对象及前因变量，考虑了集体行动对公众的动员效应这一问题，探讨了目标合理性、行为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等因素对旁观者支持态度的影响，这为理解集体行动背景下旁观者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所得研究结果可以使人们更深入的了解集体行动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对于公共管理事业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6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关注与探讨。

首先，本研究主要探讨了目标合理性、行动策略及目标实现预期等因素对旁观者支持行为的影响，对于具体研究结论，尽管本研究在问题提出与讨论部分分析了其中可能的作用机制，但没有对这些可能性进行进一步的实验验证。其中，情绪变量可能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例如，在集体行动具有合理目标的情况下，旁观者可能会因弱势群体的不公正遭遇产生更强的愤怒感，并因此有更积极的支持态度；如果此时旁观者又预期集体行动很难达成目标，他们可能会对抗议者产生更强烈的同情，进而降低对抗议者所采取的暴力策略的抵触。

其次，本文虽然在讨论部分根据实验结论，区别了旁观者与利益相关者参与或支持集体行动的心理机制上差异，但这种区分主要是理论上的推演，并没有在研究中直接体现，今后的研究应该通过更直接的比较澄清不同群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心理过程。再者，从群际互动角度看，本研究所涉及的集体行动都属于低威胁情境，在这种情境下旁观者的支持行为不会对自身产生太多负面影响；但在高威胁情境下，旁观者对集体行动的支持需要付出高昂代价，他们可能会被内群体或其他社会关系所孤立，也可能受到来自对立群体的伤害与制裁。在这种背景下哪些因素会主导旁观者的支持行为？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考虑到这些问题，关注不同情境下集体行动对旁观者动员效应的差异性，更好的揭示集体行动背景下旁观者行为的影响机制。

参 考 文 献

Barth, M., Jugert, P., Wutzler, M., & Fritsche, I. (2015). Absolute moral standards and global identity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collective action against global injusti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7), 918−930.

Bashir, N. Y., Lockwood, P., Chasteen, A. L., Nadolny, D., & Noyes, I. (2013). The ironic impact of activists: Negative stereotypes reduce social change influ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614−626.

Becker, J. C., Tausch, N., Spears, R., & Christ, O. (2011). Committed Dis (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radical collective action fosters disidentification with the broader in-group but enhance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8), 1104−1116.

Blackwood, L., Terry, D., & Duck, J. (2015). When believing in the union is (not) enough: The role of threat and norms in intentions to act on union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belief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7*(2), 65–74.

Blackwood, L. M., & Louis, W. R. (2012). If it matters for the group then it matters to me: Collective action outcomes for seasoned activist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 72–92.

Gamson, W. A. (1990).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Belmont, CA: Wadsworth.

George, T. S. (2002). *Minamata: Pol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eenaway, K. H., Cichocka, A., van Veelen, R., Likki, T., & Branscombe, N. R. (2016). Feeling hopeful inspires support for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Psychology, 37*(1), 89–107.

Jiménez-Moya, G., Spears, R., Rodríguez-Bailón, R., & de Lemus, S. (2015). By any means necessary? When and why low group identification paradoxically predicts radical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1*(3), 517−535.

Klandermans, P. G. (2014).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liticized identities: Identity processes and the dynamics of protest. *Political Psychology, 35*(1), 1–22.

Leach, C. W., Iyer, A., & Pedersen, A. (2006). Anger and guilt about ingroup advantage explain the willingness for political ac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1232–1245.

Mannarini, T., & Fedi, A. (2012). Persisting or withdrawing? An insight into the psychosocial processes underlying sustained engagement.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2*(4), 300–315.

McGarty, C., Bliuc, A.-M., Thomas, E. F., & Bongiorno, R. (2009). Collective action as the material expression of opinion-based group membership.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4), 839–857.

Owuamalam, C., Issmer, C., Zagefka, H., Klaßen, M., & Wagner, U. (2014). Why do members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strike back at perceived negativity towards the in-group?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4*, 249–264.

Paladino, M. P., Zaniboni, S., Fasoli, F., Vaes, J., & Volpato, C. (2014). Why did Italians protest against Berlusconi's sexist behaviour? The role of sexist beliefs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in explaining women and men's pathways to protes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3*, 201−216.

Ransford, H. E. (1968). Isolation, powerlessness, and violence: A study of attitude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Watts Rio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581−591.

Saab, R., Tausch, N., Spears, R., & Cheung, W.-Y. (2015). Acting in solidarity: Testing an extended dual pathwa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by bystander group member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4*(3), 539–560.

Saguy, T., Chernyak-Hai, L., Andrighetto, L., & Bryson, J. (2013). When the powerful feels wronged: The legitimization effects of advantaged group members' sense of being accused for harboring racial or ethnic bias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4), 292–298.

Scheepers, D., Spears, R., Doosje, B., & Manstead, A. S. R. (2006). Diversity in in-group bias: Structural factors, situational features, and social fun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 944−960.

Shepherd, L., Spears, R., & Manstead, A. S. R. (2013). "This will bring shame on our nation": The role of anticipated group-based emotions on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 42–57.

Shi, J., Hao, Z., Saeri, A. K., & Cui, L. J. (2015).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Impacts of typ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8*(1), 45–65.

Shuman, E., Cohen-Chen, S., Hirsch-Hoefler, S., & Halperin,

E. (2016). Explaining normative versus nonnormative action: The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37*(6), 835−852.
Solak, N., Reifen Tagar, M., Cohen-Chen, S., Saguy, T., & Halperin, E. (2017). Disappointment expression evokes collective guilt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intergroup conflic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egitimacy perceptions. *Cognition and Emotion, 31*, 1112−1126.
Stewart, T. L., Latu, I. M., Branscombe, N. R., & Denney, H. T. (2010). Yes we can: Prejudice reduction through seeing (inequality) and believing (in social chang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1), 1557–1562.
Tausch, N., Becker, J. C., Spears, R., Christ, O., Saab, R., Singh, P., & Siddiqui, R. N. (2011). Explaining radical group behavior: Developing emotion and efficacy routes to normative and non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1), 129−148.
Thomas, E. F., & Louis, W. R. (2014). When will collective action be effective? Violent and non-violent protests differentially influence perceptions of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among sympathiz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0*(2), 263–276.
Tilly, C. (1995).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an Bergen, D. D., Feddes, A. F., Doosje, B., & Pels, T. V. M. (2015). Collective identity factors and the attitude toward violence in defense of ethnicity or religion among Muslim youth of Turkish and Moroccan Desc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47*, 89−100.
van Zomeren, M., Leach, C. W., & Spears, R. (2012). Protesters as "Passionate Economists": A dynamic dual pathway model of approach coping with collective disadvantag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2), 180 –199.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08).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504–535.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12). On conviction's collective consequences: Integrating moral conviction with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 52–71.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Spears, R., & Bettache, K. (2011). Can moral convictions motivate the advantaged to challenge social inequality? Extending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4*(5), 735–753.
Wiley, S., Srinivasan, R., Finke, E., Firnhaber, J., & Shilinsky, A. (2013). Positive portrayals of feminist men increase men's solidarity with femini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7*(1), 61−71.
Wright, S. C., Taylor, D. M., & Moghaddam, F. M. (1990). The relationship of perceptions and emotions to behavior in the face of collective inequal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4*, 229–250.
Xue, T., Chen, H., Yue, G. A., & Yao, Q. (2013).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Effects of 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 on group–based emotions and efficacy path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5*(8), 899–920.
[薛婷，陈浩，乐国安，姚琦. (2013). 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的作用：群体情绪与效能路径. *心理学报*, *45*(8), 899–920.]
Yin, R., Zhang, F. F., Wang, Y. Y., & Zang, R. X. (2017). Protest encounters setback: Effects of emotional reactions on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in context of frustrate collective ac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9*(4), 482−499.
[殷融，张菲菲，王元元，臧日霞. (2017). 当抗议遭遇挫折：集体行动失利情境下情绪反应对行动意愿的作用. *心理学报, 49*(4), 482−499.]
Zaal, M. P., van Laar, C., Stahl, T., Ellemers, N., & Derks, B. (2011). By any means necessary: The effects of regulatory focus and moral conviction on hostile and benevolent forms of collective 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 670–689.
Zhang, S. W., & Wang, E. P. (2011). The motiv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mass incident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2), 1730–1740.
[张书维，王二平. (2011). 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动员与组织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730−1740.]
Zhang, S. W., Wang, E. P., & Zhou, J. (2012).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different context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4*(4), 524–545.
[张书维，王二平，周洁. (2012). 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 *心理学报, 44*(4), 524–545.]

When will bystanders support collective actions? The roles of claim legitimacy, protest tactic and expectations of achieving goals

YIN Ro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Weifang University, Weifang* 261061, *China*)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protest in achieving its original aims may depend primarily on the events' extent which shape public opinion. Collective action may play a significant and indirect role in influencing social change through changing public opinion. Partly, the success of a movement may derive from mobilizing the public to perceive a current context as illegitimate and turning bystanders into supporters. Though there is vast literature on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promoting collective action,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collective actions influence a broader non-protesting community. The obtained articles mainly focus on the processes or mechanisms underpinning bystanders' support for the social movement. We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three key factors in

shaping bystanders' endorsements.

This paper contains three experiments conducted to examine our hypothesis that participants were presented in a news article describing an instance of social protest during these studies. The details of the news were different in each group. Study1 was a 2(claim legitimacy: high vs. low) × 2 (protest tactics: violent vs. non-violent) design. Study2 was a 2(claim legitimacy: high vs. low) × 2 (protest tactics: violent vs. non-violent) × 2(expectation of achieving goals: high vs. low) desig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indicate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claim legitimacy, their support for the protests and other questions. Study 3 followed the pattern of Study2, but the background event was different.

Results of Study1 showed that protests with legitimate claims were more supported than those with illegitimate claims in contexts of non-violent tactics. Meanwhile, there was only marginal difference of endorsements between participants in high-legitimacy group and low-legitimacy group when collective actions were violent. Study2 showed that in context of violent tactics, participants' expectations of achieving goals could mode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claim legitimacy and their endorsements for collective actions. Participants' supports for violent actions were positively predicted by claim legitimacy when there were little possibilities to achieve goals. However, this effect didn't exist when possibilities of achieving goals were high. While in contexts of non-violent tactics, expectations of achieving goals did not affect participants' endorsements for collective action. Only the factor of claim legitimacy was effective. The results of sStudy3 revalidated the results of Study2.

The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is as following. First, legitimacy of the claims is the primary factor affecting bystanders' support for collective action. Only when the protest's aims accord with moral standards of the public will it gain the endorsements of public. Second, the use of violent tactics could even reduce bystanders' endorsements of those protests with very legitimate claims. Violence may be seen as an action of alienation from the mainstream,which undermines the broader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a movement. Third, low possibility of achieving goals could inspire bystanders' endorsements of violent collective actions when the claims are legitimate. Bystanders will lower their hostilities toward violence when they expect it will be very hard to achieve legitimate claims.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bystander; claim legitimacy; non-violent action; violent action